

求是集



第一集

求是集

陈乐素著

第一集

求是集(第一集)

陈乐素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2插页 292,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册

书号 11111·202 定价 3.00元



作者陈乐素教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摄于无锡

序 一

王 越

清代康、雍、乾三朝迭兴文字狱，摧残士气，无微不至，学术思想为之窒息。聪明才智之士，“避地畏闻文字狱”，乃趋于考据。他们在诠释古籍，考证典章文物方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除了个别人（如戴震）以外，其著述之思想性，甚为贫乏。晚清国事日非，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跳出“朴学”的小圈子，而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治史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关心国家的盛衰兴亡，鉴古知今，发为说论，使人振奋，使人兴起。时代愈近，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使史学界取得一把开启历史奥秘的钥匙，把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条件，作为创造历史的前提而加以探索。他们重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把历史研究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联系起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历史问题，亦有利于研讨社会历史变迁发展的规律。我国史学界在这方面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可喜的贡献。

陈乐素同志幼承庭训，受到严格的陶冶；青年时

期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潜心研究，成绩卓著。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嚣张，其野心就是要把整个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违反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镇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运动，顽固地执行其对敌妥协投降的路线。乐素同志目击时艰，先后发表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以及《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几篇文章，其用意是以古况今，有所贬斥。第一，日寇侵略中国，造成绝大的祸害，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千多年间中日的友好关系，而且危害世界和平，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其次，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妥协的路线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危害国家主权的路线。八百多年前北宋的昏君徽宗，尚且调兵遣将，试图恢复久被契丹贵族霸占的燕云十六州，虽由于政治和军事之腐朽，遭到失败，但此种规复国土的思想，“绝不能谓为谬误”。八百多年后的国民党当局对日寇实行不抵抗主义，不崇朝而丢掉了东北数省，不数年而华北变色。对比之下，国民党当局之昏聩，岂不是更令人切齿痛恨。我记忆所及，“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章太炎于北平公开演讲，斥国民党当局为“石敬瑭”，义正辞严，数千听众为之悲愤填膺。可见富有爱国精神的学者，对民族败类，口诛笔伐，严于斧钺。

《三朝北盟会编考》以及《徐梦莘考》更是乐素同志

的力作。他在文章中谴责宋高宗赵构与秦桧摧残抗战派，“以遂行其所主张之苟安的妥协主义”；并指出徐梦莘幼遭国难，铤铄余生，“痛愤之回忆，遂导之为事实之寻究”，这几句话也道出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时期许多爱国学者的心声，乐素同志就是其中的卓卓者。

《三朝北盟会编考》共分“撰者、本书之内容、传本、原书书目、书目有名而未见引用者、全书引用材料索引、未标明出处之引用材料、《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校补、引用书杂考、宋金史帝纪会编举异”凡十个部分，搜罗抉剔，引证翔实，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未道，令人联想起陈垣同志的著作。同时也联想到列宁的几句话：“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①这些话是针对统计学和社会学来说的，可是对历史研究来说，要根据正确的资料并须尽可能掌握与问题有关的全部资料，岂不是也一样重要吗？据我看来，乐素同志对这《会编考》所下的功夫是符合上述的原则的。

我个人对于徐梦莘这部《三朝北盟会编》，既肯定其富有参考价值，又认为他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对于历史资料的取舍，未免有偏私之见。徐氏自言，“不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79—280页。

敢私为去取，不敢妄言褒贬”。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看来，未必如此。例如吕好问在金人围汴梁时，曾受张邦昌之伪命，充门下侍郎，因而遭到舆论的抨击。邓肃的《论事楚叛臣札子》，极论吕氏罪有应得。可是，徐梦莘于引用这个《札子》时，竟删却与吕氏有关的部分，其偏袒吕氏，显而易见。刘知几有云，“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①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士大夫，苟且偷生，贪求富贵，受伪朝之命，做奴隶的奴隶；丧失气节，莫甚于此。徐梦莘还为之掩饰，这就严重地违反史家“直笔”的原则了。当然，徐氏这部《会编》凡二百五十卷，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编者的观点，虽然存在上述的缺点，然而瑕不掩瑜，不失为沾溉史学界的长编。乐素同志孜孜矻矻为之考证，溯其源流，明其体例，理其头绪，正其讹误，并为之校补，使这部《会编》，更增加其参考价值。

史学界都知道，一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有待进一步研究；元人所编纂的《宋史》，缺点很多，亟待修订。乐素同志这部《求是集》第一集所载的论著，一部分涉及古代中日的关系，大部分则涉及宋代的历史，考证既然详备，论断又很严谨。我相信这部集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的读者都是很有帮助的。

1985年2月于广州暨南大学

^① 《史通·内篇·曲笔》。

序 二

徐 规

两宋时期，我国经济、文化发达昌盛，史学研究的成就超越前代，史学著作大批出现，特别是多卷本通史、当代史和方志书的编修，取得显著业绩。同时产生了新的历史编纂体裁——纪事本末体，还开辟了金石学这个新园地，把历史研究的范围，从文献资料扩大到金石器物。

元代学者本可在上述基础上撰成一部质量优秀的宋代史，而结果是元末官修之《宋史》，不仅内容繁芜杂乱，史实错谬缺漏，且论述编次，亦多失当，为明清学者所不满，曾先后数次重修，因限于条件，未能收效。

清季以来，宋人所撰本朝史籍，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清人所辑的《宋会要稿》诸巨著相继刊刻、影印，广泛流行，给近人研究宋代史提供较好的条件。同时，在西方新史学影响下，我国学者转而从事宋史专题研究，写出不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本师陈乐素教授就是一位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并

获得丰硕的成果。

乐素先生幼聆庭训，学有渊源。少年时，又东渡日本读书。回国后，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叶，在上海《日本研究》杂志刊布《魏志倭人传研究》、《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两文，阐幽显微，论断精审，引起日本学者的注目与推重。“九·一八”事变以后，即专心钻研宋代史事，短短四年间，相继发表论著四篇，其中《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两文，约十五万言，网罗弘富，考订详实，为先生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国内外研治或评介徐梦莘其人及其书者，莫不资藉于此。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秋，先生携眷自香港脱险进入内地。时浙江大学国史教授张荫麟师因病逝世，先生承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推荐，应浙大校长竺可桢师之聘，至贵州遵义，担任文学院史地系教授，主讲《唐宋史》、《日本史》和《中国目录学史》等多种课程，旋兼史地研究所导师。自是直至一九四九年，青年学子从治宋史者颇多，经由先生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后来不少人在学术上皆有所建树。其时正值战争岁月，生活艰苦，图书缺乏，先生仍夜以继昼，力事著述，陆续刊出论文十余篇，涉及宋代重要史籍与其作者、宋代社会与阶级关系、宋代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地方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问题，多独辟门径，贡献甚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留意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视野更加广阔，然而由于先后担负学校行政和出版社编审工作，黽勉从公，个人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十年浩劫中，又屡遭折磨，研究工作几陷停顿。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政策、措施深得人心。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志在千里，又重返杭州大学（其前身为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历史系筹建宋史研究室。翌年冬，南下广州，为暨南大学历史系创办宋史研究室，继续替国家培养研究人才，并潜心述作，发表多篇论文，为史学界所称颂。

今岁，暨南大学宋史研究室应各方请求，汇编先生历年论著为《求是集》，付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既有利于国内外学者的参考，亦将推动我国宋史研究事业的发展。

规忝列门墙，逾四十载，受教良多。今承命为《求是集》作序，自惭浅陋，未能表彰先生学术之精髓。所幸常绍温同志撰写《陈乐素同志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情况述略》一文，对先生道德文章已有翔实的纪述，谅读者可从中得到启迪。

1984年5月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

陈乐素同志从事教育和 学术研究情况述略

(代序)

常绍温

陈乐素同志是目前我国老一辈宋史研究学者之一，现年八十一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整六十年。今年四月，暨南大学曾为此开会庆祝。他的经历，体现了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中，通过工作和生活实践摸索救国之道，受到时代的教育，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及为发展祖国教育文化事业，在漫长岁月中如何艰辛奋斗的过程。近年以来，有不少同志探询他的著述情况和治学经历。因此暨南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特将他历年所撰论著之尚能收集到者，编为论文集付印，名之为《求是集》。并由我对他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情况略加介绍，以为代答。限于个人水平，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求是集

陈乐素同志，广东新会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幼小时，祖父对他期望甚殷，取名博。他成年后钻研学问，深慕历史上一些高风亮节之士往往安贫乐素，刻苦自励，以道德学术名世，于是更名乐素。他日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就长期使用这个名字。

字。

乐素同志的祖先经营药材生意。他的父亲陈垣同志是当代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擅长考据学、元史、宗教史等见称于国内外，先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达四十六年之久。乐素同志就是在他父亲的熏陶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

乐素同志从小就爱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听讲历史故事。六、七岁时就喜欢看《三国演义》。陈垣同志针对他的爱好，教他把这部书中每一回初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那时他虽然还不能完全认识书中的字，便已开始摘录书中英雄人物的事迹和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起了学习历史的极大兴趣。这可以说是他以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的萌芽。

一九一八年乐素同志十六岁，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日本留学的四年中，除上课外，他的业余时间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学习：一有机会就去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经常去图书馆，为陈垣同志收集有关宗教史的资料，同时抄录、翻译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及经济、时事方面的论文。一九二一年，他所译的关于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加强了他研究日本的信心。这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使他对日本学术界重视中国文化和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情况，产生了深刻印象。他佩服他们的刻苦钻研精神，同时对他们研究的的目的性也感到惊奇和怀疑。一九二三年他从日本返回祖国，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语文和历史，重点是教历史课。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工作的需要，个人的兴趣，使他迫切地要求增广历史知识，开拓认识历史现象的眼界。正好那时他家中有一部竹简斋《廿四

史》，尽管并非善本，他也立刻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通过这样的边干边学，开始了有系统地阅读中国历史典籍，为他以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伐战争前夕，广东地区作为革命的策源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乐素同志目击了革命形势如何发展和高涨：孙中山先生依靠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国民革命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一九二五年六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给了广东反革命势力及其支持者英帝国主义以何等沉重的打击；……。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轶事，对孙中山先生产生了敬仰之情；现在又受到时代的现实教育，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第五军政治部宣传员，一面根据总政治部的宣传纲领宣传革命，一面积极学习国民革命的理论。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的反动派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动“四·一五”政变，在广州展开了血腥大屠杀和大逮捕。鉴于国共合作局面已被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乐素同志在苦闷彷徨中脱离了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八年初赴上海，进入蔡廷锴将军及一些广东同乡联合兴办的民众烟草公司暂做文书，同时利用余暇搜集史料，正式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

陈乐素同志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从研究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展开的。二十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野心日增无已，不仅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国的东北，要求所谓“特殊利益”，也觊觎着我国的内蒙古；除进行政治、经济的控制和渗透外，还派了一批批学者来作所谓“史地考察”。乐素同志还在留学日本时已多少觉察到，有些日本学者之着重研究中国，未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他曾经注意到：在日本学术著作中，有一些是

对中国有着友好愿望，爱好中国文化，为探讨学术问题而研究中国的；另一些则带有蔑视中国，以为积弱不足道的色彩。这时就更加感觉到这些“史地考察”，必有一些与日本军部的侵略意图有关。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不能对这种局势熟视无睹，爱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拿起笔来，为唤起同胞注意尽一份力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于是着手研究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特别是甲午战争史。一九二九年，他进入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杂志社担任主编，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对《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以及我国南朝宋、齐、梁、陈各朝历史和隋、唐史上有关日本史料的仔细钻研，并对某些朝鲜古籍和日本古籍作了认真的考察，经过比较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在《日本研究》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发表了其中的《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这两篇文章系统地探索了后汉至南北朝时期中日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考证了中日古籍记载中的差异之点，提出了对日本古代史上一些未决问题的看法。例如，《后汉书》和《三国志·魏志》都有邪马台国遣使来中国朝贡的记载，《魏志》并记有该国的详细情况和女王卑弥呼的名字。同时两书又都有“倭”和“倭国”等词称。这些名称的渊源和含义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日本古籍中的“大和国”关系怎样，各该国坐落何处等等，在日本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邪马台国与后汉、特别是与三国时魏国的交往，是日本古代史中的一件大事，搞清邪马台国的情况，有助于搞清日本古代史。关于邪马台国的地望，当时有着“大和说”、“熊袭说”、“肥后山门说”、“筑后山门说”等多种不同主张；关于该国女王卑弥呼，不少人认为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功皇后。而“倭”和“大和”的日语音训都是Yamato，与汉文中的“邪马

台”相近似，三者是否同一国家？而《魏志》中既有邪马台国，又有倭国，是否当时有两个同称Yamato的古国同时存在于日本列岛？这些都是那时日本古代史讨论中的重要问题。乐素同志经过对我国和日本及朝鲜三国史籍的仔细钻研考证提出：《魏志》中的邪马台国在九州北半部的中南；“倭”的名称是后汉初期以来中国对日本古代民族的称呼，它的来源虽不确知，必早于后汉，且当是据日本语音的汉译，而非如某些解释所说“倭字从人，从禾，从女，倭国皆繁盛”之类的意译，更不带歧视的含义。他认为，“倭”字之读音为Yamato，源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作者误认神功皇后为卑弥呼，把神功皇后和日本诸天皇所都的畿内，即《古事记》所说的大倭和大和，当做卑弥呼的王都邪马台；而畿内立国之祖神武天皇的名字也就被冠以“神倭”字样，称为神倭伊波礼毗古。从而Yamato一词带上了神圣的色彩，成为“日本民族之灵”。此外，又因《汉书》中“倭”字一称指日本民族，于是把“倭”与“Yamato”合而为一，读为Yamato，而大和的“和”是“倭”的谐音，遂也读为Yamato。因之，“因根本立足点有误，遂至联带之推想无不误，而后此千余年来沿此误以为史实。”实则，“定此倭之名称，距日本之有文字早数百年，而所谓邪马台，为魏时倭中女王国都名；倭与邪马台其音迥异，其文亦悬殊，其强牵合之者，显为后来之事”。即是：倭，是中国对于日本民族的总称，在后汉以前已出现；《魏志》中的邪马台女王是倭人的一支，女王国地点在九州北半部之中南，比大和之读作Yamato时间上要早；大和之读为Yamato，应是它的统治者南下扩展至邪马台国以后的事。此外他还对中国史上所记日本古史的一些中缺部分，根据朝鲜史籍作了考证，对照中、日、朝三方面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加

以系统的论述。这两篇文章内容翔实，在某些方面有创见，考证有功力，就当时来说，为日本学术界深入探索 and 解决日本古代史上的疑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有益论证，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当时的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中山九四郎先生认为它们是“中国青年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是“比较精细的新研究”和“有益的文字”，“有必要加以介绍”，曾在《东洋史讲座》和《大日本史讲座》的《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专著中分别加以较详的转载。^①

乐素同志所以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证后汉至南北朝之间日本的历史，是希望从中日友好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在涉及由学术、宗教以至日常饮食起居习惯以及中日交通、贸易等多方面的广大领域中，中国文化的传播，给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以如何程度不等的重要影响。而这一点，虽然为一些公正的日本学者所承认（如木宫泰彦的早期著作《中日交通史》），却正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极力抹煞；指出古代中日双方很早就开始了友好的相处、往来的关系，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欺凌中国，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力图以武力攫取我国东北的野心，我国人民应该警惕，日本人民也应警惕，日本的学者们更要“谨防上当”，以免在“学术考察”的名义下为日本军部的侵略野心所利用。正当他在这个学术领域继续钻研，准备陆续完成隋唐至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千余年间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史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一震撼了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① 《大日本史讲座·支那史籍上之日本史》昭和十一年（1936年）再版本第五、七、九章。